



新中国文学的领潮者和发现者

□黄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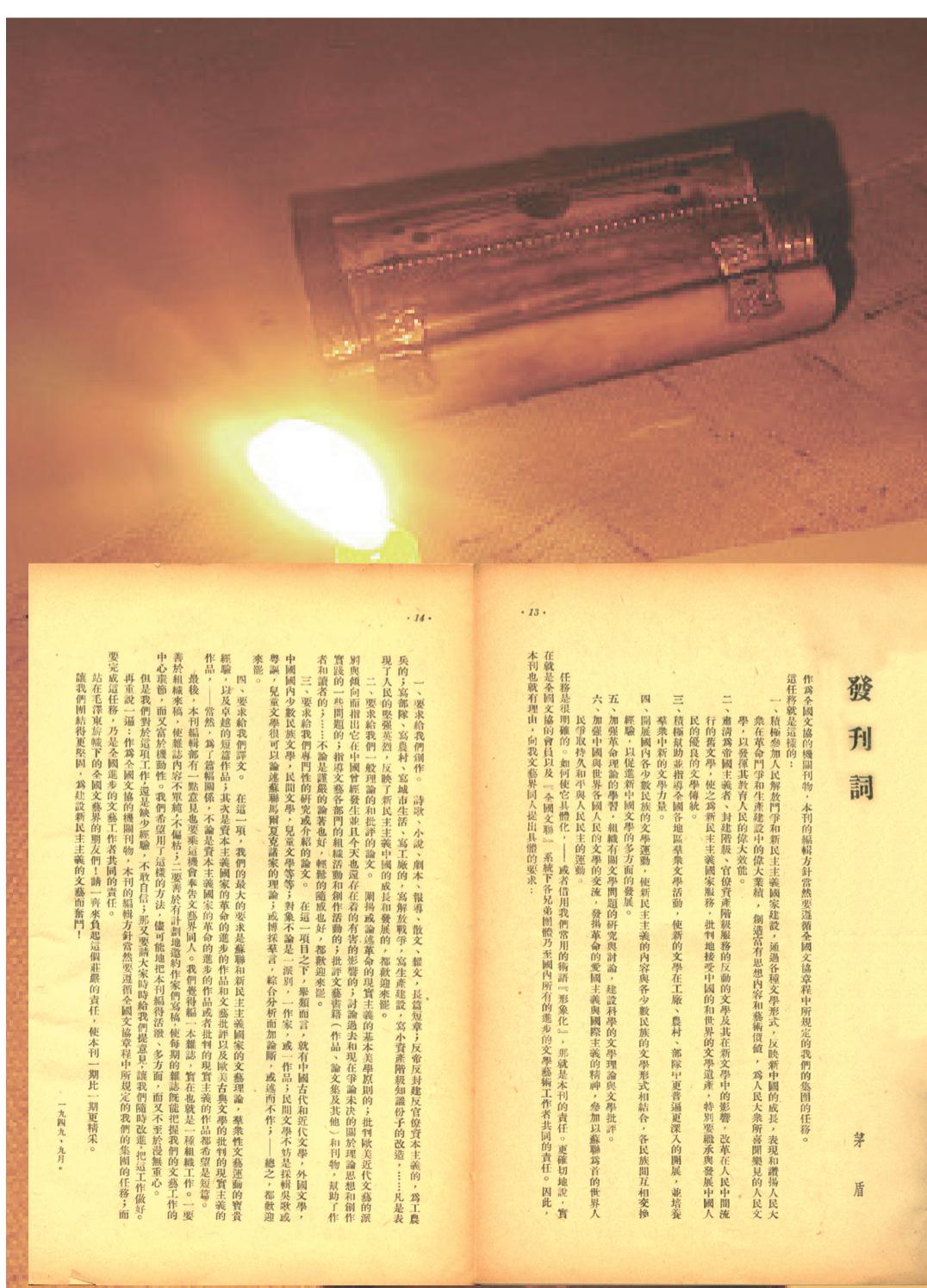
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毛泽东专门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经毛泽东提议由郭沫若题写,1976年复刊后的刊名题字在征求毛泽东的同意后,从其1962年给《人民文学》主编的信件中集字而成。《人民文学》的历任主编为茅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袁水拍、张光年、李季、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李敬泽、施战军。《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键的文艺阵地,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负责对作家提出创作上应该遵循的思想方针与艺术路线,对作家创作的基本立场、题材范围、表现对象、风格类型、审美形式进行引导与规范。《人民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领潮者,在文学潮流的形成与更迭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民文学》既是期刊样板和规则制定者,又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更重要的使命——出人才出精品,推动文学持续的繁荣。

在中国当代的文学格局中,中国作家协会对文学秩序的生成与维护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省市级文学期刊几乎都是仿照《人民文学》的办刊路线。作为同时具备组织、引导功能和权威性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从创刊以来其总体定位为发表艺术精湛、技巧娴熟的优秀作品的高端平台,代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准。只要翻阅70年的《人民文学》,不难发现这本刊物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浓缩版,那些具有标杆意义的杰作和先声夺人的领潮之作荟萃其中,珠玉满盘,令人目不暇接。

20世纪50年代,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审美上别具一格;赵树理的《三里湾》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中间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蒙古族英雄史诗《嘎达梅林》、撒尼族长诗《阿诗玛》从多民族文化的宝库中开掘出具有持久魅力的文化宝藏;还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和孙犁的《铁木前传》,其中鲜活的人物至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60年代,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赖大嫂》等作品,从不同向度回应现实,推开

(上接第1版)黄坤明强调,要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力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理念,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宣传建设美丽中国取得的欣喜成效,涵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引导农民群众依靠勤劳智慧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系统进行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和保护工作,深化良渚文化研究,不断加深对五千年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认识,传承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切实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坤明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已进入扩大覆盖、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要把中心建设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紧紧抓在手上,着力构建整合化平台、建设常态化队伍、打造品牌化活动、开展精准化服务,大力创新工作体制机制,激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文明实践蔚然成风。



了一扇扇穿越时空的精神之门。新时期初期是《人民文学》的爆发期,激情燃烧,用文学想象点燃思想的火炬,点燃报国的情怀。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报春花,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破冰船,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标举科学精神的灯塔,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重塑了军事文学和战争想象,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对城乡关系进行敏锐的观察与睿智的沉思,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以忧伤的诙谐反思社会的浮沉与人性的异化,还有周立波的《湘江一夜》、张弦的《记忆》、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和《乡场上》、王蒙的《春之声》、李国文的《月食》、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汪曾祺的《故里三陈》、陆文夫的《围墙》……这简直是流转不息的精神盛宴!这些在文学史教科书中和大学课堂上经常被讨论的作品,组队从《人民文学》的平台走入读者的内心,汇入时代的涛声。

进入80年代中期,湛容的《减去十岁》、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张炜的《一潭清水》、贾平凹的《黑氏》各领风骚,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李锐的《厚土》、郑万隆的《老马》等作品为“寻根文学”开山筑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残雪《山上的小屋》、莫言的《红高粱》《欢乐》和《爆炸》、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等作品为“先锋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震云的《塔铺》《官场》和方方的《白雾》是“新写实小说”的重点作品。在鲁迅文学奖设立以后,不妨来看看《人民文学》首发的获奖作品:第一届——阿成《赵一曼女士》、陈世旭《镇长之死》、何申《年前年后》、李国文《涅槃》,第二届——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和鬼子《被雨淋湿的河》,第三届——毕飞宇《玉米》、孙慧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王光明和姜良纲《中国有座鲁西监狱》,第四届——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葛水平《喊山》、郭文斌《吉祥如意》,第五届——王十月《国家订单》,第六届——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第七届——肖江虹《封面》、弋舟《出警的日子》。当然,还有更多没能获奖的佳作,如群星错落,闪烁七彩光芒。

多种文体争奇斗艳,全面开花,这种景观是《人民文学》超群出众的独家本领,延续了在“百花时代”奠定的特色。“百花文学”的大多数代表性作品都刊发于《人民文学》。“百花文学”几乎覆盖了所有文类,小说、特写、诗歌、杂文、话剧、评论等多种文体都涌现了特色鲜明的佳作。各种文

体形成内在呼应,从不同角度关注现实问题,都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内在灵魂,又能够发挥不同文体各自的优势,相映生辉。值得注意的是,“百花时代”《人民文学》封面百花争艳的系列图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百花文学”的一种精神象征。事实上,《人民文学》正是新中国文坛上最为夺目的文学花园,其中展示的文类风格、语言方式、主体选择,都浓缩了各个时期的文学精华。

《人民文学》不仅是领潮者,还是文学新生力量的持续发现者。茅盾在《创刊词》中就对文学普及和人才培养功能有专门的阐述:“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文学期刊对潜在的文学可能性的发现,比追捧名家力作具有更加值得称道的文学史意义,发现文学的新生力量是编辑工作的创造性集中体现,其前瞻性成为文学波涌不息的活力源泉。《人民文学》从来不缺名家的追捧,编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自觉。1985年第3期《编者的话》中有言:“有人讥讽《人民文学》是‘名人文学’,它可能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不足。我们将努力改进,但这绝非编者的初衷,也不尽符合事实。”正如编者在1994年12期的《江山代有才出》一文中所言:一家能够引领文学潮流的文学刊物,应当是“老一代名家青春永驻、迭长新枝的百花花园,是创作队伍主力军龙腾虎跃、大显身手的演武场,是文坛新秀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点将台”。

新时期初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莫伸的《窗口》、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王润滋的《内当家》、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北岛的《宣告》、顾城的《给安徒生》都是这些文学新人的成名作。从1984年到1986年,中国文学呈现出百舸争流的新气象,多种风格的交相辉映打破了齐声合唱的单调与沉闷,新人辈出的态势更是激发出文学创造的勃勃生机。这一时期,阿城的《树桩》和《孩子王》、李杭育的《土地与神》和《草坡上那只风筝》、乌热尔图的《望着露珠的清晨》、梁晓声的《父亲》、张炜的《一潭清水》和《海边的雪》、张辛欣的《回老家》、蒋子丹的《昨天已经古老》和《今夕是何年》、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为热闹的文坛吹入清新的新风。贾平凹这一阶段发表于《人民文学》的重要作品有《秦腔》《黑氏》《龙卷风》,此前他还发表了《鸟窠》《夜籁》《小城街口的小店》《连理桐》《黄陵柏》,1982年和1983年各发了两篇,成了《人民文学》重点关注的青年作者。王安忆最早在该刊发表的作品是《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1980年6期),随后陆续发表了《窗前搭起脚手架》《我爱生活》《麻刀厂春秋》《阁楼》。铁凝在1982年7期发表了《短歌》,随后相继发表

《构思》《银锁》《近的太阳》。这些重要作家大多凭借其具有审美冲击力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开放的空间中展示卓尔不群的艺术追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现代派”前卫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作为先锋文学代表作的《红高粱》、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喜马拉雅古歌》、洪峰的《生命之流》、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显示出《人民文学》的敏锐眼光和非凡远见。

在发掘新生代作家时,《人民文学》既重视作品,也力推作家,用跟踪性的扶持来推动其艺术探索。从1993年到1998年,《人民文学》对新生代作家的推举具有系列化、规模化、点面结合的特点。韩东、朱文、鬼子、李冯、东西、徐坤、李洱、毕飞宇、邱华栋、丁天、鲁羊、刁斗、红柯、荆歌、徐小斌、海男频频亮相,展示新的灵感、才情和活力。1998年设立的“本期小说新人”栏目推出了部分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入选“本期新人”的作家有周洁茹、徐庄、艾伟、戴来、吴光焰、石舒清、陈继明、朱文颖、张弛、谢宏、刘玉栋、李浩、王方晨等,像艾伟的《乡村电影》、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均出手不凡。2002年新设的“新浪潮”栏目专门推出首次在该刊露面的新人,2002年9期推出重点发表新诗人作品的“诗歌特大号”,2003年又推出年度性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5年开始和《南方文坛》联手推选“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2007年11期推出“青年作家特大号”。2017年开设的“90后”栏目陆续推出崭新的文学面孔和充满锐气的新作品。2016年第9期“青年小说展”的头条作品是肖江虹的《傩面》,编者在“卷首”中流露出执著于发现的热情与责任感:“本期的‘青年小说展’,显现了年轻作家表达文心、世相、成长、奇幻等多方位上的多彩多元的艺术能力。我们为他们的创造而感到,为他们的厚实而欣慰,为他们的才华而点赞,为他们的清新而欢悦,更为他们未来无尽的可能而心怀羡慕和热爱。”正如施战军在杂志创刊65周年之际所言:“在老家大树般的荫庇下,希望开出新的妍丽花朵来。”

可能性与文学的未来视野密切相关,不断成长的新人是文学保持活力的源泉。作为领潮者,《人民文学》必须高瞻远瞩,对新生力量的发掘是用文学预见编织未来文学图景,而且对于中国文坛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义。作为发现者,《人民文学》为自身发展注入连绵不息的后劲与艺术潜能,以后浪推动前浪,激活文坛的创造激情与创新活力。艾青在1986年2月为《人民文学》题写卷首语的时候,有这样的形象表述:“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人民文学》的编辑确实以吐丝的形式苦心经营,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的努力,编织出中国当代文学绚丽而壮观的历史长卷。

1949年创刊的《人民文学》

□王 军

1949年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在北平中法大学成立。上午,丁玲主持大会,茅盾致开幕词,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下午,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草案,并进行了选举。7月24日上午,大会选举常务委员会21人,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最后,郑振铎致闭幕词。

新通过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第一条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章程第三条规定了宗旨:团结全国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学工作者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文学而奋斗。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下设编辑出版部,负责编辑并出版刊物、丛书与资料等。

7月29日上午,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在东总布胡同22号机关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会议决定由艾青、钟敬文、何其芳负责编辑部(后为艾青、靳以。编辑部人选原有丁玲、欧阳山,后去掉了)。丁玲临时提议,应在文联内设立全国编辑刊物委员会,并拟请茅盾兼任主任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

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登了《全国文协出版〈人民文学〉》:“【本报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倾决定出版月刊一种,定名为‘人民文学’,由茅盾、欧阳山、冯雪峰、艾青、何其芳分任编辑委员,茅盾任主任委员,社址已预定北平王府大街多福巷十六号(‘华北文艺’社旧址),现正积极筹备中,闻十月一日即可与读者见面。”

这里面透露出时间和地点两个重要信息。“人民文学”准备于10月1日与读者见面,这份筹备中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期刊,准备向新中国成立献礼。从地面上看,多福巷16号是原《华北文艺》编辑部所在地(后来又成为丁玲的宿舍)。《华北文艺》于1948年12月25日在河北石家庄创刊,是文艺月刊,主编欧阳山,由华北文艺界协会编辑部编辑。1949年5月1日迁往北平,7月1日出至第六期终刊。第六期上刊有《中共中央致文代会贺电》《文代会电中共中央暨毛主席致敬(电)》原

文。《华北文艺》编辑秦兆阳、王燎莹又都成为创刊后的《人民文学》编辑。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给茅盾写信:“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写,不宜要我写。”这是茅盾请毛泽东为《人民文学》题写封面刊名,毛泽东给他的回信。毛泽东虽然没有题写刊名,却为即将创刊的《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毛泽东的题词,确立了《人民文学》权威的历史地位和神圣的社会职责。

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首期出版,这是全国性第一份文学期刊,刊名由郭沫若题写(1976年复刊后的刊名题字经毛泽东同意改用毛泽东题字)。编辑者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地点没有设在多福巷16号,而是设在文协机关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

成立于1948年的出版工作委员会,是负责接收北平乃至全国出版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它决定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批中央级期刊只有9种,文艺方面的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而《人民文学》是唯一专门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分别承担了《人民文学》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1951年,《人民文学》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1月,《人民文学》不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营,改由《人民文学》编辑部自己发行。1958年8月1日,成立于1953年的作家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开,成立单独机构,划归中国作家协会领导。1980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个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在凝视出发点中重温初心,在回望来时路中铭记使命:“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正如茅盾所说:“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正如巴金所言:“它会来,它一定要来……要迎来一个灿烂的黄金时代。”正如铁凝所祝福:“未来它会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它将和时代与人民一道,迎来更壮丽的风景!”